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汉代博局纹铜镜探究

秦欣欣

汉代时期，博局纹铜镜最为流行，造型精美富于变化，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神秘的思想意蕴，可以说是汉代铜镜中较具典型的镜式之一。博局纹镜又称“TLV”镜，规矩纹镜等，诸多外国学者因其显著的“TLV”图案称之为“TLV”镜，而规矩镜这一名称是由留日学者梁上椿引入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的方格规矩镜，最早见于1942年梁上椿撰写的《岩窟藏镜》，梁氏称：“外人称为TLV式，国人则以字铭命名，梅原氏谓为方格规矩云。”随着我国考古发掘的深入，更多铜镜藏品被发现及研究，尤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刻具博局去不羊”四神博局镜为此类镜式的定名提供了有力实证，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对博局纹铜镜有了更深层面的清晰认知和深入研究。

汉代博局纹铜镜一般为圆形，镜背有钮、钮座、钮座外主体纹饰、主纹饰外缘、镜缘五个部分，镜钮大多为圆形钮，钮座有圆形钮座和柿叶纹钮座两种，钮座内或有乳钉纹或铭文带装饰，主体纹饰为“TLV”图像之间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或饰禽兽、禽鸟、龙凤、神人、鸟羽、云纹、乳钉、几何等纹饰，主纹饰外缘有栉齿纹、锯齿纹、双钱三角纹等，镜缘有窄缘、宽缘、平缘、凹缘等样式，缘上或饰有勾连云气纹、锯齿纹、三角纹、点珠纹、变形神兽纹等。通过对汉代博局纹铜镜类型、纹饰、铭文等的研究，对探究汉代时期的社会风气、思想理念、审美观念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新乡市博物馆前身系平原省博物馆，收藏有原平原省所辖豫北和鲁西56县(市)的出土传世文物3万件(套)，其中铜镜是青铜器藏品中的重要一类，所藏铜镜近300面，其中汉代铜镜120余面，博局纹铜镜20余面，本文从中选介几面博局纹铜镜，为研究汉代铜镜尤其是博局纹铜镜提供真实的实物资料。

十二地支四方神灵博局纹镜(图1)

此镜于1983年河南省文物商店征集购买，拨交新乡市博物馆收藏。镜直径13.2厘米、厚0.55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围方框内有带圆座的12枚乳钉和十二地支柳叶篆书铭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间环绕。主体纹饰是四方神灵博局纹，钮座外方框上、下、左、右对称分布四个T形纹，两侧各有带圆座乳钉两枚，T形纹延伸处各有一L形纹，四个L形纹每两个中间各有一V形纹，在“T、L、V”形纹之间间隔饰四方神灵纹，青龙配独角兽、白虎配玄武、朱雀配鸾鸟、龟蛇合体的玄武配神羊且做回头状。主体纹饰外依次有一圈栉齿纹，一圈锯齿纹，镜缘处饰一周云气飘逸的流云纹带。这类带有“TLV”图像的铜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及东汉早期，不论是“TLV”图形符号还是四神、五灵等神灵异兽的祥瑞图案，都反映出中国古代人对祖先以及神灵的崇拜意识，体现了当时人们认为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

四神八乳博局纹镜(图2)

此镜系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958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12.8厘米、厚0.65厘米，圆形，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外双弦纹围成方形界格，界格内饰几何状的云气纹，界格外八座乳钉纹和“TLV”图像符号将镜背划分为四方八区。每方区内均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及伴兽，青龙配长尾兽、白虎配瑞兽、朱雀配鸾兽、龟蛇合体的玄武配神羊。主体纹饰外环绕一周栉齿纹，镜缘处饰一周三角锯齿纹和一周双钱三角纹，双钱三角纹间隔饰点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古代先民崇拜的神灵，被称为四神，又有四灵、四象之称，《礼记》有云：“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汉代时期流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又四神乃大地四方之神灵，《三辅黄图·汉宫》有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此四神纹饰既能安定四方又能辟邪纳吉，在汉代时期非常盛行，常见于汉镜和新莽镜之上。

凤鸟简化博局纹镜(图3)

此镜系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958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11.2厘米、厚0.48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围绕一周单弦纹圈外切双弦纹凹面方形界格，界格四边饰简化博局“T”形纹，界格四角相对饰简化博局“V”形纹，“T”形纹与“V”形纹”将主体纹饰分为四区，其间饰飞翔的凤鸟与禽鸟，四鸟两两相对，展翅翘尾，翘首顾盼，主体纹饰外环绕一周栉齿纹，镜缘处饰双圈锯齿纹内饰一周双钱三角纹。凤鸟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铸造在铜镜上的凤鸟纹被古人视为祥瑞的象征。

“来言”云气纹博局镜(图4)

此镜于河南省新乡市李士屯村发掘，1973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13.2厘米、厚0.5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围绕一周单弦纹圈外切双弦纹凹面方框，弦纹对称四边与方框四角均饰有简化几何纹样。主体纹饰为“TLV”图像符号和8个带连弧乳座乳钉纹，其间空隙处皆填以几何云气纹。主纹饰外有一圈铭文带“来言之始自有纪，溱治锡铜去其宰，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铭文外饰栉齿纹，镜缘处饰一周三角锯齿纹和一周双钱三角纹，双钱三角纹间隔饰点纹。

“尚方”四神博局纹镜(图5)

此镜由河南省新乡市废旧公司收购，1977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17.8厘米、厚0.5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双钱凹面方框，方框内饰12枚带座乳钉间十二辰铭文。主纹饰以“TLV”图像符号、8枚带连弧乳座乳钉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与之相配的羽人、祥瑞禽兽等构成的四方八区格局，四方八区内青龙与白虎皆配鸾鸟，朱雀配瑞兽、龟蛇合体的玄武配羽人。主纹饰外一圈铭文带“尚方作竟(镜)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铭文外饰栉齿纹，镜缘处饰两周三角锯齿纹间有一周双钱三角纹。“尚方”为秦汉时期官名，掌制作御用器物，东汉时置置，制作镜鉴亦为其职之一，出现了“尚方作镜真大巧”“尚方御竟大毋伤”“尚方作镜四夷服”等铭文。

四神铭文博局纹镜(图6)

此镜系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958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16.6厘米、厚0.46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双弦纹围成方形界格，界格内四角饰12枚带座乳钉间十二辰铭文。主纹饰以“TLV”图像符号划分为四方八区。每区饰有一枚带座乳钉纹和一神兽纹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及与之相配的羽人、独角跑兽等祥瑞禽兽。主纹饰外一圈铭文带，些许铭文不甚清楚，大致应为“□□作竟(镜)四夷服，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官位普照天下复。”铭文外饰栉齿纹，镜缘处饰一周三角锯齿纹，外有一周勾连环绕的云气纹。汉代时期，古人认为铜镜是可与天地相通的神器，常将铭文作为铜镜之装饰，传达追求长寿、家族富贵安康、子孙繁衍的美好愿望。

四神博局纹镜(图7)

此镜系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958年入藏新乡市博物馆。镜直径9.5厘米、厚0.58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围绕一周单弦纹圈外切双弦纹凹面方框，方框四角饰有简化几何符号。钮座方框四角和“TLV”图像符号将主体纹饰分为四方八区，每区内饰有一枚乳钉纹和四神、瑞兽、羚羊、羽人、禽鸟等纹饰，主体纹饰外环绕一周栉齿纹，镜缘处饰一周锯齿纹和一周勾连环绕的云气纹。

简化神兽博局纹镜(图8)

此镜于1983年河南省文物商店征集购买，拨交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直径10厘米、厚0.35厘米，圆形，圆钮，钮座外围绕一周单弦纹圈外切双弦纹凹面方框，方框四角饰简化几何图案。主纹饰以“T”形纹和“V”形纹分为四区，每区各置一神兽，青龙、白虎、朱雀各占一方，四神中独缺玄武，被一神兽所替代。近缘处环绕一周栉齿纹，镜缘处饰一周双钱三角纹。汉代铜镜纹饰中四神是辟邪祥瑞的象征，有四神皆有的，也有组合装饰的，还有单独装饰的，因此常有四神缺位的现象，为满足四方需求，常以祥瑞神兽代替。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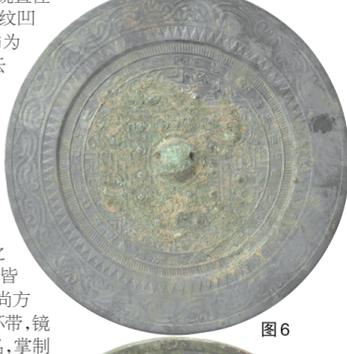


图6



图7



图8

近日，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在孔林消防工程施工时发现墓志一盒，整体保存状况较好，边缘略有残损，青石质。志盖高54厘米、宽72厘米、厚15厘米，无纹饰，正面阴刻篆书5行15字“五十二世孙监修官前权祀孔君墓志”，字高11厘米、宽7厘米。墓志字迹清晰，长方形，宽73厘米、高57厘米、厚25厘米，阴刻楷书志文共32行，满行24字，共618字，字径2厘米，最后一行有2字磨泐缺损。

墓志铭文

宣圣五十二世孙监修祖庙官前权祀孔君墓志。至元辛未冬十有一月癸未，孔君卒于正寝二孤等哀感，丧制皆得其礼之本，涉释老术之讹信者蔑有也。观者曰：“嘻！孔氏哉”。既殁，其少子淑，哀杖持君行状，曰：“先君在殡，封有日矣。敢以志诸”。

呜呼！自祖庭劫火之余，大工未举，且礼乐残缺，迨丑失序，执政者未加定议，天下有「圣师之欲之叹。孔氏之贤，如今先君等，寔欲始终其心者也。」志未克就而值此大故，予方恻惜之不得，无无言乎？乃为次第之。

按，君宣圣五十二世孙，讳之文，字才叔，自四十四世祖、吏部尚书公，「讳勤，字自牧，始别为小宗，至四十六世宗翰，字周翰，侍郎公，又「别焉，已下世次，详于宗系图。

君资谦和，无少长，咸称有礼，自「幼入庙学，已有明敏称，及长，辟乱于楚州，遂为州学谕。时孔莛「州闻君名，召以厚币，馆而求教其子，供给之富，无异康年。然「君常以「祖庭坳堦为心，且私计其苦之祸，必不免于宋，即弃所有而西，「踰年，宋果屠苜，其险患保身乃如此。初，兵革荐臻，君之考妣「诸父，皆仍蒙难，既至，俱令葬之。

时衍圣公被「命招收太常礼乐，君与有力。复以林庙户事见委，君跋涉「艰勤，坚请于「上，竟得百户，以充洒扫，衍圣公嘉之。「祖庭工役，监蒞之职，常任之，虽祀事亦屢委播焉，其见重如此。」

君之处家，虽细事不略，及接以公务，家事无复内顾。君之在「楚州也，先取贾氏，无子，早卒。教授单公，即妻以女孙。单初无子，「乃为君求继于氏，得一子，曰汪，二女，单乃思育如己出。单「后有子，即淑也，人皆以为贤德所召。嫡弟二人，今且老，和睦犹「一日。长女妻士人徐儒，即君之外甥也。少女适乡人段隰。孙「六人，曰：思周、思义、思齐、思聪、思温、思贤，女孙「十一人，俱幼。君春「秋七十有二，寔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祖圣墓之西南，盖从君治命也。古语未五刊。」

前济州教授杨桓撰，翰林院书写李程书并口「额。孔文墓碑尚存孔林，题额「五十二代权祀君墓」，亳州同知东野楷书丹，滕州同知李贞篆额，碑刻下部文字约300字，与墓志记载吻合，亦是碑刻文献缀合之幸事。

孔文家世背景及其子孙

志主是孔子五十二世孙，生于金承安五年(1200)，卒于元至元八年(1271)，金朝末年，颍里曲阜饱受战乱，时局动荡，兵连祸结，祖庙失修，孔文秉资谦和，聪明机敏，谦逊保身，营葬先君；颇得衍圣公孔元措器重，协助礼乐建设，收集乐谱，整理乐器，排练乐舞；积极奔走，向朝廷陈请，得以恢复守庙百户，以充洒扫，监蒞祖庭公而忘私，提领工役作风勤勉，多次接受衍圣公的委托，权摄祀事。其婚配情况，先娶贾氏早卒，再娶单氏，继娶于氏，生二子二女，有孙六人，女孙十一人，享年七十有二，根据世表曲阜元、权主祀事孔治安排，葬于孔子墓西南。

经查阅孔氏家谱，自中兴祖至志主孔文，世系流传如下：

中兴祖孔仁玉—孔勛(44代)—孔道辅(45代)—孔宗翰(46代)—孔伋(47代)—孔松(48代)—孔班(49代)—孔拯(50代)—孔元石(51代)—孔文(52代)。孔伋，朝散大夫；孔松，宣教郎；孔班，子二；孔拯，省委提领监修祖庙；孔元石，监修祖庙；孔文，祖庭权主祀事，提领监修林庙，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孟庙内现存最早的元碑是蒙哥四年(1254)的《先师至圣国公续世系图记碑》，记载了孟子以后的孟氏世系图谱，碑阴立石题名有“主奉宣圣祀袭封衍圣公孔文措……监修宣圣庙提领孔文……世表曲阜元令孔治”。孔文和当时的衍圣公以及后来的衍圣公，时任县令孔治共同题名，对孟氏世系传承进行认定和见证。

孔淑，孔文之次子，字世仪，著《〈至元一统志〉颍里世系》，升承事郎、秘书郎，终承事郎、濮州城武县尹。现存孔庙由杨桓篆额的《颍里庙祭器记碑》记载了孔淑和其子孔思通聚集孔庙祭器情形，孔林存其墓碑。

孔文之子孔注的长子孔思温，监修祖庙提领，次子孔思达，青田县尹。孔淑和其子在蒙元时期的仕宦人数达24人，孔淑的7个儿子皆入仕途，孙辈和曾孙辈的仕宦数量颇多。长子孔思遵，字从道，三氏学教授，历渭川县主簿、江陵判判、安陆府知事、嘉祥县尹，征按察使，孔林存其墓碑。次子孔思通，字宏道，恩州教授，曾任颍州儒学教授、滕县和郟城主簿、临颖县尹、陕西儒学提举、河中府判，其曾孙《大德三年颍里庙小学记碑》，现存孔府二门里；篆额《至顺三年重修宣圣庙题名碑》，现存孔庙。三子孔思速，字进道，历三氏学学正、曹州教授，中书省左三部照磨，曲阜县尹，立石《皇庆

武垣城遗址位于河北省肃宁县高北镇雪村村西。据有关文献记载，公元前350年燕国在此置武垣县。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赵外攘地北至燕，武垣县归属赵国。汉代仍置武垣县于此，西汉属幽州涿郡，东汉属冀州河间国，北朝时期属瀛洲河间郡。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武垣县并入河间县，此后逐渐废弃。武垣城始建于战国，兴盛于两汉，废弃于隋唐，有近千年的历史文积淀，在遗址附近曾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2013年3月，武垣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肃宁县文保所收藏有两件武垣城遗址出土的汉代鎏金嵌贝铜龟。铜龟身长12厘米、宽6.5厘米。龟体为铜铸，昂首，作爬行状，背嵌蚌壳，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由于年代久远，鎏金已大部分已脱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垣城遗址周围许多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出土的文物被破坏而抛之于野。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即是在此时出土，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文保所工作人员杨月和征集到肃宁县文保所收藏，现借展于沧州市博物馆。

那么，这两件铜龟在当时是做什么的？

其实，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叫作席镇。在汉朝人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桌子、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家具，当时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地上铺席，坐于席上。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是席地而坐，如读书讲学、朋友宴饮、会客座谈等，都是坐在席上进行的。即便是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家，屋里也只有矮床、几案、屏风之类的简单家具。矮床即可用于睡觉，也有坐具的功能，上面也要铺席。席子多由芦苇、蒲草、藤条等编织而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落座时席子还容易移动。《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记载：“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草席易卷的特性。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需要在席子的四角压上重物，使其平整，席镇就是席子四角的压件。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席镇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战国时非常流行，那时的席镇造型还比较简单，一般做成秤锤的样子，只起到镇压的作用。到了汉代，席镇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制作越来越精美，造型也多种多样，有虎、豹、鸟、羊、鹿、熊、龟、蛇以及人物等，并有鎏金、错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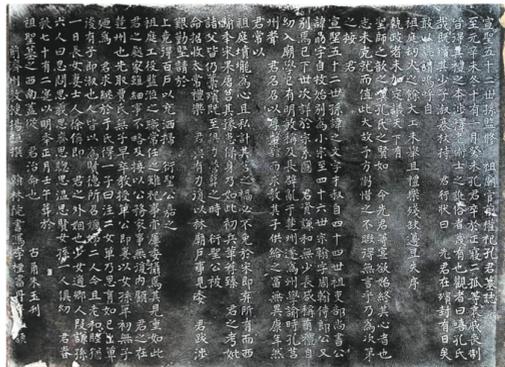
那么，这两件铜龟在当时是做什么的？

其实，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叫作席镇。在汉朝人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桌子、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家具，当时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地上铺席，坐于席上。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是席地而坐，如读书讲学、朋友宴饮、会客座谈等，都是坐在席上进行的。即便是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家，屋里也只有矮床、几案、屏风之类的简单家具。矮床即可用于睡觉，也有坐具的功能，上面也要铺席。席子多由芦苇、蒲草、藤条等编织而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落座时席子还容易移动。《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记载：“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草席易卷的特性。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需要在席子的四角压上重物，使其平整，席镇就是席子四角的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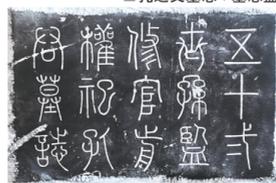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席镇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战国时非常流行，那时的席镇造型还比较简单，一般做成秤锤的样子，只起到镇压的作用。到了汉代，席镇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制作越来越精美，造型也多种多样，有虎、豹、鸟、羊、鹿、熊、龟、蛇以及人物等，并有鎏金、错金、

元五十二代权祀孔君孔文之墓志考释

张富勇



▲孔文之墓志▼志盖



▲孔文之墓志▼志盖

二年也先不花拜林庙题名碣)，现存孔庙；曾蒙额《宣氏祖莹碑》，现存书院街街道官家村，后迁大乐署署丞，升大常礼院院判，精通律吕，撰《大元乐书》五卷，孔林存其墓碑。四子孔思迪，字凝道，历胶西主簿、安庆录事、光山尹、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湖广都事、太常礼院院判、同知礼仪院使，孔林存其墓碑。五子孔思永，字常道，庙学正，后为东平路同知。六子孔思礼，字安道，孔淑弟，林庙司乐，迁内台管勾，孔林存其墓碑。七子孔思立，字用道，累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知经筵，位列宰辅，为元代曲阜孔氏家族官宦最高者。孔思立相关的碑刻较多，孔林存其墓碑，《大德五年重建至圣文宣王廟碑》《后至元年孔思立祭孔碑》《后至元年六年修奠宣圣庙碑》《至正八年梁兒只左丞相相等代祀碑》《后至元年勅修曲阜宣圣庙碑》现存孔庙，为衍圣公孔思晦书丹墓碑，现存孔林。

墓志所涉宗族演变和衍圣公争立情况

随着孔氏族众丁繁，逐渐形成了四支五位、二十派六十户。如孔文之次子孔淑为二十派中的第十派，占据了其中七户，即第三十华店户、第三十一古城户、第三十二冈山户、第三十三鲁城户、第三十四孔屯户、第三十五西城户、第三十六旧城户。

南北二宗和三公并存。由于宋金时期南北对峙，“衍圣公”出现了南宗和北宗。北宋末年，建炎二年(1128)，衍圣公孔端友南渡寓居衢州，成为南宗，之后孔冲、孔播、孔文远、孔万春、孔洙相继袭封南宋“衍圣公”。金兵入主中原后，阜昌二年(1131)，伪齐刘豫政权封孔端友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天眷二年(1139)，金仍封孔璠为“衍圣公”，成为北宗，先后传孔拯、孔德、孔元措等。蒙古占领中原后，封孔元措族弟孔元用为“衍圣公”，孔元用随蒙古军西征，以元用子孔之全为“衍圣公”。鼎足而立的局面造成了金在汴梁(开封)、南宋在衢州、蒙元在曲阜各立有一个“衍圣公”，同时三公并存。

爵位空悬和袭封之争。蒙古蒙哥汗元年(1251)，孔元措去世，因无子，以族弟孔淑之子孔之固的长子孔演嗣爵，由于孔演生母曾被孔之固正妻任氏赶走改嫁李姓奴隶，孔演也因此一度改姓。孔演袭爵后，曾任衍圣公的孔之全及其子孔治对此强烈不满，联合族人状告，攻击孔演喜欢校猎，不修祖祀，不事儒雅，非孔氏之子。这场纷争导致孔演被剥夺爵号，孔廷也没有再立孔演袭封。墓志中说：“执政者未加定议，天下有圣师之欲之叹”即指衍圣公爵位一度停止袭封，空置长达40年。孔演被罢免后，在宪宗朝孔氏争夺爵位时，孔文和孔端操到东平路总管府辩证，积极参与家族大事。

墓志题署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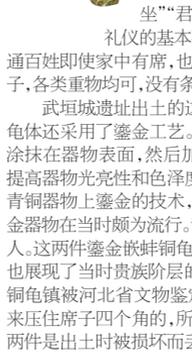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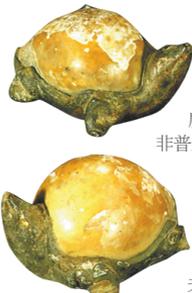
杨桓(1234~1299)，字武子，兖州濰州人(今濰州区)，历济宁路教授、太史院校书郎、秘书监丞、秘书少监。杨桓是书法大家、文字学家、工书精篆，著有《六书统》《六书溯源》《杨学正韵》。杨桓的夫人孔氏是孔子五十三世孙。杨桓撰写、书丹、篆额的碑刻存世较多，现存曲阜的有至元十九年(1282)撰文《重修颍里庙垣碑》，现存孔庙十三碑亭院；至元三年(1294)篆额《颍里祭器碑》，现存孔庙崇圣祠东南；大德三年(1299)篆额《颍里庙学记碑》，现存孔府二门里；大德三年(1299)杨桓撰书的《处士王先生墓碑》，现存汉魏碑刻博物馆；为去世的“衍圣公”兼曲阜县令孔之全墓志书丹(1264)，现存孔林，由于孔之全是孔子五十二世孙，故署名“予”为“济州教授”。杨桓的儿子杨克明亦是书法家，篆额《泰定四年皇姊大长公主降香碑》，现存孔庙，篆额《至正十年曲阜历代沿革志碑》，现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朱玉，刻工，曾与杨桓合作，刊刻至元十九年《重修颍里庙垣碑》。

孔文墓志篇幅虽然较短，但就其内容来看，其系孔氏后裔的重要人物，子孙仕宦众多，该墓志保存了宋金元鼎立时期社会的若干实物史料，同时还涉及金元时期衍圣公争立等历史背景和相关史实，它是研究宋金元时期政治和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亦可补充孔氏家谱记载，对研究封建嫡长承袭制等宗族制度历史，进一步认识孔氏家族支派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系《山东省碑刻石刻保护与利用路径探究》(批准号：23CLYJ19)阶段性研究成果

武垣城遗址出土的鎏金嵌蚌铜龟镇

王金顺



▲席镇

嵌贝等装饰工艺。汉代的席镇已是实用器和艺术品的完美结合。席镇的材质非常多样，最初的席镇多为玉石材质，汉代时青铜材质较为多见，也有金质和银质等。从工艺和材质来看，席镇并非普通百姓使用之物。“席”在中国古代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份不同，用席的数量也会不同。《礼记·礼器》中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是说，天子的坐席有五层，诸侯的坐席有三层，大夫只有两层。《论语》中也记载：“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这说明“席”是古代礼仪的基本要求，且明显是对古代贵族阶层的要求。普通百姓即使家中有席，也不会对席子有过多要求，即使需要压住席子，各类重物均可，没有条件使用材质珍贵、工艺繁复的席镇。

武垣城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席镇背嵌蚌壳，蚌壳润泽光亮，同时龟体还采用了鎏金工艺。鎏金是一种将金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器物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以提高器物光亮性和色泽度的传统工艺。在战国时期，我国便有了在青铜器物上鎏金的技术，到了汉代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鎏金器物在当时颇为流行。青铜器本已华贵，再鎏上金子，更显尊贵逼人。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在反映出汉代高超的铸造工艺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1994年8月，这两件鎏金嵌蚌铜龟镇被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因为席镇是用来压住席子四个角的，所以一组完整的席镇一般由四件组成，另外两件是出土时被损坏而丢弃，还是没有被发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民族生活习俗的传入，开始出现新型坐具如“筌蹄”“胡床”等。筌蹄类似于后来的绣墩，胡床类似于今天的马扎，这些坐具的出现为垂足而坐的习俗提供了可能。到隋唐时，桌、椅、凳等新型家具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此后，我国古人的坐姿习俗逐渐由席地而坐进入到垂足而坐的时期，而用于压席的席镇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席镇虽已消亡，但压平物品的需求依然存在，由席镇演变而成的“镇纸”在文人雅士的书房中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